

# 試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

李志夫  
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

## 摘要

2003 年 9 月在青島所舉辦「為紀念法顯西行回國 1590 年兩岸佛學學術研討會」上，本人以開幕詞及專題發表的兩篇小文結集而成，從中印交通、佛教傳播之角度，比較他與玄奘大師在中國佛教史上所作之貢獻。本文指為：玄奘大師之「善巧」掩蓋了法顯大師之「樸拙」。從而加以廓清法顯大師在中國乃至在佛教史上應有之地位。

**關鍵詞：**1. 玄奘 2. 法顯 3. 中印交通 4. 青島 5. 絲路

## 【目次】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個人背景
  - (一) 法顯大師
  - (二) 玄奘大師
  - (三) 二者之比較
- 三、時代
  - (一) 法顯大師
  - (二) 玄奘大師
  - (三) 二者之比較
- 四、交通
  - (一) 中亞陸上交通
  - (二) 西南海交通
- 五、佛教
  - (一) 國內佛教
  - (二) 印度佛教
- 六、貢獻
- 七、結語

## 一、前言

中國的史學家，乃至佛教界的人士，對於法顯大師之研究，如與研究玄奘大師的文獻比較起來實在很少。雖然玄奘在留印之成就上及在中、印兩國所受之禮遇上來看，他在中國的歷史地位顯然比法顯耀眼；但如從兩人前後之主、客觀條件來分析，法顯所得來之成就，卻遠比玄奘來得艱鉅。

也有研究法顯大師的學者，把他的成就又抬得很高，有些已超出歷史事實。<sup>1</sup>

所以本文以法顯與玄奘兩位大師之主、客觀條件諸如個人背景、時代、交通、中印佛教等背景及二者之貢獻作一比較，也許能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真正地位。

## 二、個人背景

### （一）法顯大師

法顯大師（西元 337-422 年），俗姓龔，平陽郡武陽（今山西襄丘縣）人，兄弟四人，其中三人均於幼年死亡，父母也擔心他長不大，三歲就將其剃度為沙彌，其實仍住在家中，八歲時因害了一場重病，就正式將他送入寺廟。十歲時，其父親過世，其母親要接他回家，他拒絕了。後來他母親也過世了，就決心出家，二十歲接受比丘戒。

從此，他在寺廟中住了四十年，認為當時漢地律藏傳譯不全，所以立意到印度參訪。晉安帝隆安三年（399 年），與慧景、道聲、慧寬等人從長安出發。那時，他已是六十二歲了。<sup>2</sup>

### （二）玄奘大師

玄奘大師出生年代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：一說為隋開皇二年（600 年）；一說在仁壽二年（602 年），其先祖為小吏，但家道中落。因其兄長捷法師出家於洛陽之淨土寺，自幼隨其頌讀經典。隋大業八年（612 年），師約十二歲，

<sup>1</sup> 例如連雲山〈法顯評傳〉，載於《佛學研究》第 1-2 期合訂本，頁 143-168。其文中指出，法顯創了六個第一。其中三項為：他是第一個到達印度的中國人；第一個撰寫遊記的中國人；第一個將外文譯成中文的中國人。但這三者都有待商榷。

<sup>2</sup> 見《高僧傳》卷 3 (T50, p. 236b)。

適洛陽度僧，負責主考的大卿理鄭善果，見他對答出眾，破格以沙彌錄入僧籍。

隋唐之際，天下大亂，奘師隨其兄遠避隴、蜀、荊、趙等地，曾隨諸師習專論。因見論師所論有異，乃誓言親往天竺參學，於貞觀三年（629年）西行；或說係貞觀元年（626年），則為三十歲；即使以西元600年出生，626年西行時也才三十三歲。<sup>3</sup> 而且在他之前參訪過印度者，除了法顯之外還有宋雲等人。<sup>4</sup>

### （三）二者之比較

法顯是在一個全家恐慌其死亡的平凡家庭中出生；也沒有親情依恃，在寺廟中接受教育，自我成長，到了花甲之後才驀然地想到漢地律制不全，決心參訪印度。

而玄奘大師之童年享有平安之親情，稍長受到其兄長捷法師之呵護，受到良好之佛學教育，在當時出家是受到限制的，能受考試拿到度牒並不容易，而奘師以童子之年得授度牒更是一件光榮的事，本已天資聰慧的玄奘大師從此更增加了其自信。以釐清佛法為職志，於三十三歲之青年，滿懷抱負西行。

## 三、時代背景

### （一）法顯大師

法顯大師於東晉隆安三年（399年）從西安出發，那時長安正為後秦姚興所據。西元383年肥水之戰，東晉打敗之前秦，苻堅兵敗，為興所篡，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局面。

在南方的東晉於安帝義熙二年（420年）亦亡於宋，淪為齊、梁、陳的幾個短暫政權。雖然法顯身處五胡十六國之紛亂局面；但胡人對於佛教仍是很崇拜的。所以除了兵亂之外，並未受到胡人政權的干擾。<sup>5</sup>

<sup>3</sup> 冥詳所撰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（T50, p. 214）。

<sup>4</sup> 根據〈中國西往印度求法高僧傳〉在玄奘大師之前者，至少有六十九位。本文參考楊家駱主編，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冊6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3年三版），頁274-363。

<sup>5</sup> 北魏太武帝滅佛是在西元441年，北周武帝滅佛是在西元570年，都是法顯過世後才發生的。北方王朝各君主多信佛，如石勒、石虎禮佛圖澄為師，其弟子道安

## （二）玄奘大師

玄奘大師較之法顯大師在時代背景上算是幸運多了，尤其在他去國與返國時期，都是貞觀之治之盛世。一個盛世之國度，不但能提供國人發展的機會；更會激發國人發展之潛力與智慧。<sup>6</sup>

## （三）二者之比較

雖然在兩大師經過西域時代，佛教还是很盛，也都受到沿途國王的禮遇，但玄奘大師所受之禮遇格外優渥，甚至大多要求其留住弘法；<sup>7</sup> 而法顯一行大多只能受到短時間的接待，甚至拒絕參加當地僧侶之法會及早晚課。<sup>8</sup>

法顯一行到了印度，印度人稱他們來自「邊地」，而他們自己也不便說來

---

受符堅及士大夫的尊敬，譯經最力。鳩摩羅什受姚秦供養。其實北方王朝的國王都是很有文化教養的人物。參考趙翌，《廿二史劄記》上，收錄於楊家駱主編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，頁 99。

<sup>6</sup> 環觀中外歷史，凡國力強盛之國家必定是經濟、文化、人才匯集之地，如中國之隋、唐、元、明，乃至清代盛世，以及古羅馬帝國，及今之美國，莫不是世界人文薈萃之地，人才輩出。

<sup>7</sup> 沿途各國皆留請玄奘大師長駐。所受之禮遇如其所記有高昌國王，慰留未果，促結為兄弟後放行，並派人沿途送到中亞突厥可汗；突厥可汗再派人將他送到迦濕密邏，迦濕密邏國王並派十人為他抄經典。至於他在那蘭陀寺更是「出行乘象，與二十人從，乳酪，石密日足有餘一期之料。」

東印度拘摩羅王更派大批的象與船，溯恆河而上去見戒日王；戒日王為其召開無遮大會，讓他發表〈制惡見論〉，有十八日之久，無人敢膺其鋒。戒日王賞其銀錢三萬，金錢一萬，留居七十五日才允其回國，並派象沿途送到于闐，再由于闐派人馬送回洛陽。至於他回國受到相當之禮遇更不必提了。見冥詳所撰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（T50, p. 220）及其《西域記》（T51, p. 895b-c）。

<sup>8</sup> 法顯在西域及印度途中只有受到「幫助」，看不到他所受「禮遇」之記載。如在高昌「蒙符公孫供給遂遊西南」（T50, p. 857b），他在印度均自稱來自「邊地」（T50, p. 860b, 864c）或稱漢地（T50, p. 860c）。甚至九死一生捨命護經回到東晉，僅受到郡太守留住一冬一夏，到了京城建康譯經，亦沒有受到官式的禮遇、獎勵，乃至八十八歲圓寂時，也未受到褒揚。這可能因為他系北方政權相關的人物，東晉不是他的祖國有關。

自晉國、胡國，而權稱來自邊地、漢地；<sup>9</sup> 而玄奘大師則大放厥詞，其稱：「我秦王（太宗爲隋所封）聖德遠洽（治？），仁化遐被，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眾矣。」

甚至東印度的伽摩縵婆國國王拘摩羅說：「今印度國王多有歌頌摩訶支那秦王破陣樂者。」<sup>10</sup>

其實法顯以「漢地」掩飾故國不堪回首；而玄奘尚珍惜秦王之令譽。兩者相較亦顯兩人所表現之氣魄。平情而論，我們不能因此而貶低法顯，正因為二者之時代背景有別。

## 四、交通

接下來分析兩位法師旅印前之中印交通情況。

### （一）中亞陸上交通

在漢武帝時代中，即西元前 138～115 年，張騫兩度出使：第一次爲匈奴所拘留十三年，並逼其結婚生子。後經逃脫繼往西方諸國，返漢時故意避開匈奴故道，經羌地僱返。告以西域大宛有天馬，武帝遂拜張騫爲中郎將，率領三百眾，人、馬各二，牛羊萬數，金帛萬千。騫以其名列副使，分派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、烏孫等國，以後各國先後使漢來賀，漢封騫爲博望候，其繼任者亦按例封博望候。<sup>11</sup> 長期擁有撤馬爾罕以東之地，以重視西域之經營。

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（西元 73 年），以班超爲假司馬官職，隨騫、憲、班固出擊匈奴，而以班超分兵前擊伊吾，以後他長期駐守西域三十一年，諸國時反、時服，直到他七十歲時「行須扶杖，四肢不仁」，他的夫人及其妹也專書向漢帝苦苦請辭，七十一歲時八月回到洛陽，九月即病逝。他固守了疏勒以東的領域。<sup>12</sup>

<sup>9</sup> 法顯出國時是北方之後秦政權，亦即姚興弘始元年，在那個年代北方政權交替頻繁，是沒有祖國可以依靠的。所以自稱來自邊地、漢地。

<sup>10</sup> 印度人當時尚不知隋之秦王已做了大唐的天子，仍以秦王〈破陣樂〉名聞全印。（T51, p. 927c, T51, p. 895c-896a）。

<sup>11</sup> 張其昀監修，《中國歷史地圖》下冊，「東漢與西北諸國戰爭圖」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，1984 年），頁 100。

<sup>12</sup> 張其昀監修，《中國歷史地圖》下冊，「張騫通西域圖」，頁 40。及《後漢書》卷 4，頁 2687。

雖然，到了東漢已喪失了撤馬爾罕到疏勒以西之地，而總的來說在法顯經中亞之前的陸路早就通了，這與先後時代之經略政策之改變並無關係。

朱士行爲中國僧人西遊之始（西元 260 年），已早於法顯一百四十年，不過僅及于闐；<sup>13</sup> 甚至中印交通尚可溯及史前上古時期，在此存而不論。<sup>14</sup>

## （二）西南海交通

漢元帝時（西元前 48～33 年），「自徐聞、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，又船行可四月……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謔離國即印度西南沿海之 shaliyat 港……步行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。」<sup>15</sup>

東漢時中印海上交通：從月氏高（？）國（kabul）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槃起國（Bengal）皆身毒（Sind）之地，……其與大秦（羅馬）通……至桓帝延熹二年（159 年）及四年（161 年）年頻從日南、徼外來獻。<sup>16</sup>

從《前漢書》所記，自廣東到印度約九個月零二十天；而法顯從印度到牢山為整整十個月，由此可知法顯時的海上交通已很平常了，而且航時相近。

至於兩位大師由中亞到印度的道路，亦早已有前人開道，不足以掠前人之美。<sup>17</sup>

<sup>13</sup> 朱士行爲中國沙門西遊之始，於甘露五年（260 年）出發，早法顯 260 年，雖僅及於于闐，未至印度，確為西行之先導。他譯有《放光般若》，並遣弟子法饒送回洛陽，自己仍留在西域抄譯經典，因為當地信奉小乘，禁止大乘經典流入中土，因為「惑亂正典」故。見《高僧傳》卷 4 (T50, p. 346b-347a)。

<sup>14</sup> 「西周之初……西封季縵於春山（今蔥嶺）……海外諸國旃塗（漢地亦稱身毒 Sind）……《莊子》〈山本篇〉之建德國……因祇（Hind）……皆來貢獻。」楊家駱主編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第 1 集，第 1 冊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3 年印行，三版），頁 4。

<sup>15</sup> 見《前漢書》卷 28，下，地理志；並見楊家駱主編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第 6 冊，頁 39，即印度西南沿海之 shaliyat 港。參考註 17 合浦船步。

<sup>16</sup> 見《後漢書》卷 118；及楊家駱主編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冊 6，頁 40-42。

<sup>17</sup> 就法顯言，前有班超、張騫、朱士行之北路開拓，2003 年 6 月 21 日中央社電：廣西合浦縣，古城頭村，發現了西漢時的船步（碼頭），已經證實了《前漢書》所記。南海早有印度西通大秦（羅馬），東通兩漢之商業往來。雖越蔥嶺，往「鐵門」經雪山到犍陀羅則是法顯之處女行。

## 五、佛教

### (一) 國內佛教

法顯旅印前，除了《曇無德律部羯磨》與《羯磨》兩卷為曹魏康僧鎧與曇諦兩所譯外，另有後漢安世高《大比丘三千威儀》，此外似別無其他戒本，難怪法顯對於當時之戒本甚感缺乏。即使一般佛典除了《四十二章經》與胡本《放光般若》外；也只有後漢安世高、支婁迦讖、康夢詳、竺大力、曇果等小卷外；西晉竺法護、聶道真、法矩、法立亦譯了一些小卷。這其間主要以安世高與竺法護兩人貢獻最大，但大方廣的經典絕大部份尚未譯出。<sup>18</sup>

再看看法顯當時西行時，國內有那些大師級人物：道安已八十七歲，道生才二十七歲，慧永在廬山創西林寺，慧遠在廬山創東林寺，羅什到姚秦一年法顯即離開長安。中國僧人冠釋姓始於道生，他那時還沒有大成就，可說僧伽制度尚未確立，中國各宗派尚未建立。不過，已有六家七宗之潛在性。<sup>19</sup>

玄奘大師西行時，除了法相宗是他一手提攜出來之外，其他九宗均已成立，而且，已有羅什譯出之中觀及《大品》般若經、論；道生已倡頓悟，及一闡提成佛說；玄奘大師已見過法顯之《佛國記》，對他西行已有重要之參考價值；他應已知道雲岡及龍門石刻佛像之事，雖然當時並不很興盛。距魏武帝毀佛已有二百年，距周武帝反佛才五十九年，對於他西行求法多少亦有些警策及啓示作用。<sup>20</sup>

在法顯時代傳譯到漢地的大乘經典極少，也沒有系統；但他卻不是以經論法義不足而欲求西行；而是以戒律不全而西行。因此可以說，法顯大師是重「隨信行」；而玄奘大師則重「隨法行」。<sup>21</sup> 這並不表示說兩者獨偏一行，而是指出他們兩人西行之動機而言。實際上，玄奘大師在西行乃至回國途中，都嚴守戒律，唐太宗以利祿相供養均拜辭不受；而法顯以願力犧牲性命，而求保全所帶回之經典，均足以說明他們在行持上是信行、法行都重要的。

<sup>18</sup> 從藏經目錄即可對照出來，不必一一轉述。

<sup>19</sup> 從佛教年鑑、年表即可明白，亦不必轉述。

<sup>20</sup> 因周武帝滅法時，玄奘大師約二十六歲，以他求法之願力，不可能無動於衷。

<sup>21</sup> 《解深密經》卷 3，「我施設隨法行，菩薩是利根性，由不依法得奢摩地，毗婆舍那故；我施設隨信行，菩薩是鈍根性。」（T16, p. 698c）

## （二）印度佛教

法顯大師到印度時距佛涅槃才八百七十九年，距龍樹入滅才四十九年，距提婆入滅才二十九年。法顯住印十四年，回到中國後三十六年，世親才造《俱舍論》、唯識二十、三十等頌。<sup>22</sup> 因此，他參訪印度時的朝聖心情比玄奘應有較深切的感懷。<sup>23</sup>

玄奘大師到印度之主要目的是要弄清世親一系之思想，<sup>24</sup> 他返回長安是在西元 658 年，距世親已有一百九十八年，距覺賢過世僅一百六十八年，距陳那過世一百二十八年，距護法過世九十七年，玄奘到印度時他的老師眾賢已是七十歲上下了。也可以說玄奘大師是印度唯識學派的末代傳人。<sup>25</sup> 因為在印度以後沒有比玄奘法師更具影響力的唯識學家。

法顯參訪了三十個國家，在國外十四年；玄奘途經一百三十八個國家，在印度有一百零八個國家，費時十九年。他比法顯法師在印度多參訪之國家大都在德干高原及西南印度地區。<sup>26</sup>

除此而外，法顯訪印時代印度國家比較統一，所以看起來國家就比較少；玄奘訪印時，印度較為分裂，看起國家較多。<sup>27</sup>

雖然玄奘訪印時塔寺傾圮尤多，小乘佛教僧伽減少；<sup>28</sup> 却有那爛陀寺獨

<sup>22</sup> 從佛教年鑑、年表即可明白，亦不必轉述。

<sup>23</sup> 他曾幾度在瞻仰聖蹟時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如經祇園精舍遺址處（T51, p. 860c），在耆闍崛山佛說《首楞嚴經》處（T51, p. 863a）。在獅子國，佛化惡龍之城北，佛跡大塔。（T51, p. 864-865a）。而且所參訪之聖跡大都還存在著。

<sup>24</sup> 「是時國（唐）基草創，兵甲尚興，孔釋之道，有所未遑……願入蜀受業，……聽基邏《攝論》，《毘曇》……又入常興大覺寺就岳法師學《俱舍》……驗之聖典亦隱、顯各異，莫之能從，乃誓遊西方。」楊家駱主編，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冊 6，頁 321。錄自慧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 1（T50, p. 222a-c）。

<sup>25</sup> 在印度唯識學雖尚有其法脈延續，但均不如玄奘大師在中國傳承之顯赫另創法相一宗。

<sup>26</sup> 張其昀監修，《中國歷史地圖》下冊，「中國高僧入印路線圖」，頁 46。

<sup>27</sup> 參考兩位大師所述同一國度之地理大小即可得知，雖然表面上小國林立，但各有其宗主國，例如戒日王召集十八個國王參加無遮大會，召集十八國國王歡送玄奘大師回國，這些國家，都是戒日王的藩屬。

<sup>28</sup> 兩位大師所參訪雖是同一國度，其前、後國家之興衰，幅員之大小均不一定相同；所以在宗教之信仰上，也有變易，如以烏長國（烏仗國）為例：法顯所記有五百僧伽藍，皆小乘學（T50, p. 858a），到了玄奘所記則是「異教雜居，重佛法，教奉大乘，舊有一千四百僧伽藍已荒蕪。」（T50, p. 882b）

興；<sup>29</sup> 而法顯大師遊印時，雖聖蹟歷歷在目，聖語猶言在耳，格外親切；<sup>30</sup> 可是聖師、聖典大都還在印度文化土壤中蘊存。這兩位大師各有其幸與不幸。

## 六、貢獻

中國古代在玄奘大師之前，留學印度的僧伽不下六十九人，<sup>31</sup> 但其光輝多為玄奘大師所掩蓋，尤其法顯大師應有之地位也顯得不足輕重。但我們若一分析，在某些方面，法顯西行，對中國歷史、文化及佛教所產生之影響應更為深遠。

他是中國第一位到達印度參訪的僧人；以前朱士行參訪到于闐，那時于闐還不是中國的領土，當然他才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。<sup>32</sup> 如以現在來論，于闐已屬中國領土，那麼法顯則又算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；但這對朱士行來說是不公平的。

他是中國年紀最大的留學生，去印度前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，在印度十四年，回國時已七十六歲了。三十多年前，前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以五十多歲攻讀博士，自稱為「老童生」，比之法顯更不可同日而語。<sup>33</sup>

法顯所攜回之經典以律部及涅槃來說是漢地尙無者，具有稀少性；<sup>34</sup> 玄

<sup>29</sup> 法顯遊印時代，印度已沒有著名之佛教傳習所，也沒有有名的法師，他僅在巴連弗城，摩梨帝國及獅子國等三個國家學梵文，抄寫部份經、律；適小乘漸衰，後期大乘復興之時。玄奘大師遊印時那爛陀寺已是人才匯集，為唯識學之重鎮。

<sup>30</sup> 從其遊記字裡行間即可看出：法顯西行之目的是搜集律藏；但其足跡所行均是循聖蹟巡禮，以記載聖蹟為主，他遊印時與佛世相去不過是幾百年，所遊、所記很多處所特別指出「今猶在，今亦在」……可見其朝聖心懷之深刻。

<sup>31</sup> 楊家駱主編，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冊 6，「中國西行求法高僧傳」，頁 274-421。北宋初，政府派遣僧人往印度求法，太祖、太宗欲仿唐太宗之盛業，特建譯經院（頁 422），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（頁 423）此一時期印度佛教已衰，又無新的佛教文獻及著名的佛教大師，所以毫無可述。

<sup>32</sup> 同註 13，朱士行自己留在于闐抄寫經典，先派遣弟子送回洛陽，已取得梵書正本九十章，他自己死於于闐，年 80，弟子為其就地建塔，法益建塔後返回洛陽告知朱士行事。見《高僧傳》卷 4 (T50, p. 274)。

<sup>33</sup> 梅氏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，於中央日報撰文自我解嘲地說：「只要有決心，天下無難事，包括做一個老童生在內」。

<sup>34</sup> 法顯大師所攜回之經典：《摩訶僧眾律》、《薩婆多眾抄律》（十誦律）、《雜阿毘曇心》、《方廣般泥洹經》。在獅子國又抄得《彌沙塞律》，又得《長阿含》、《雜阿含》和《雜藏》等。

奘大師所攜回之經典數量雖多，除唯識部份外多為增益性、補充性。<sup>35</sup>

雖然遠在兩漢已經經營西域，朱士行也在西域抄寫經典，教弟子帶回國內；但經鐵門、雪山到辛頭河（印度河）則法顯才是中國法師之處女行。<sup>36</sup>

東漢時期已與印度在海上有交通及商業活動，印度是羅馬與中國交通的樞紐。<sup>37</sup> 但由於法顯之大願力、大貢獻，使得此一海路得以聞名，也使以後之海上交通更為繁榮，唐代之義淨、弘智法師都是沿著法顯航行到印度，也使得中國各時期之政府更注意海上之經營，明太祖時三保太監下西洋七次成果最為豐碩。<sup>38</sup>

法顯是首先感覺到戒律對修持佛法之重要，甚至那時，中國僧團尚未形成戒律制度，例如：二祖慧可得初祖傳法後混跡酒市。<sup>39</sup> 比法顯晚於八十年之梁武帝還建立了一些戒律要僧眾遵守。<sup>40</sup>

他並攜回了《涅槃經》，證實了道生所說眾生都有佛性；<sup>41</sup> 也使得南朝

35 玄奘大師攜回經典共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譯出之經典主要除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外，其他如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俱舍論》、《攝大乘論》、《阿毘曇論》已在國內流傳，而且，他已在國內聽講過，甚至自己也講過數次。

36 在法顯前只有張騫到達中亞撒馬爾罕，未能南下「鐵門」，只有鐵索，陡削狹窄的通道，僅能容單身通過，不適合軍隊通行。《法顯傳》云：「九驛所設，漢之張騫，甘英皆不至此。」又說：「其山唯石，望之千仞。」（T50, p. 858a）玄奘說：「石壁為鐵色，故稱（鐵門）。」（T51, p. 872a）。

37 楊家駱主編，《中西交通史料彙編》冊 6，說明在兩漢時，中國早已與印度通航。頁 34-36。

38 張其昀監修，《中國歷史地圖》下冊，「明代鄭和航海圖」其第六，第三次從東印度到獅子國至返國路線與法顯是相同的，頁 53-54。亦參見同書，「中國高僧入印路線圖」法顯之路線，頁 48。

39 「遂船光混跡，變易儀相，或入諸酒肆，或過屠門，或習術談，或隨廝役，人問之曰：師是至人何故如是？師曰：我自調心，何關汝事？」見《景德傳燈錄》卷 3 (T51, p. 221a)

40 梁武帝撰有《出要律儀》十四卷，通令全國寺廟一體遵行，因應儀律，命法超為都邑僧正，他到天監（502 年）中，日唯一食，食止菜蔬，並作〈淨業賦〉。摘自《南史》卷 617 〈武帝本紀〉。

41 「佛告迦葉：真實我者是如來性，當知一切眾生悉有，…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各各皆有如來如來之性。」（T12, p. 883b）

重門第之風氣，有了強烈之對比<sup>42</sup> 與反省。

在法顯之前，中國的傳記文學有《穆天子傳》，<sup>43</sup> 在遊記方面有《山海經》，<sup>44</sup> 在怪異志方面有《搜神記》。<sup>45</sup> 法顯之《佛國記》之寫作風格也具體地影響到《水經注》及《洛陽伽蘭記》。<sup>46</sup>

法顯生在北方，比他早十年的東晉文學家，如陶潛、謝靈運等人的散文、遊記體都名重一時，他們的風格與《佛國記》確屬不同；但當時南北朝文風都很盛，法顯未必沒有受到影響。

## 七、結語

由以上所論，可見兩漢即有中印交通，法顯不是第一位到達印度的中國人；但卻是第一位中國法師經鐵門到印度的人。

法顯前有朱士行在西域傳譯經典老死在西域，所以法顯也不是翻譯印度經典成漢文的第一人；但卻是承先啓後從事傳譯經典最為艱苦的法師。

法顯之前中國遊記有《穆天子傳》、《山海經》，所以他並不是中國第一位撰寫遊記的人；但他是撰寫印度遊記的第一人。

我們可以說：法顯在遊記體裁上，在承上啓下是很有貢獻的；可是不能說

<sup>42</sup> 永嘉之亂後，中原失陷，北方各州郡大多先南遷，為東晉政權之支柱，如琅琊王姓、陳留謝姓、洛陽祖姓、譙國桓姓、潁川庾姓，以後更有政權之中心人物桓氏（402-405年）一度篡晉未成。見林達禮《中華五千年大事紀》（臺北：大學出版社，1900年出版），頁89。

<sup>43</sup> 《穆天子傳》是晉人從戰國魏襄王卷中發掘的先秦古書，記載周穆王駕八駿馬北經流沙，西登崑崙，見西王母的故事。

<sup>44</sup> 《山海經》相傳為伯益所撰，書中多有夏、商、周地名，一般學者認為成書於周、秦之間，記有山川、部族、物產、花木鳥獸、風俗，也多怪異志。《四庫全書》列為小說家類。與《佛國記》多屬遊記性質。魏晉之世，文風均盛，法顯生於當世亦應受到薰習，寫出他的《佛國記》。

<sup>45</sup> 干寶（?-336年）字令升，新蔡（河南）人，永嘉五年（311年）渡江傳有《搜神記》。與陶淵明、謝靈運均為東晉之文學家，都早於法顯數十年。法顯西行前一直住在北方，是否能讀到南方之著作不得而知。

<sup>46</sup> 法顯以後，另有兩部有名的遊記：一為鄖道元（?-527年）之《水經注》，一為北魏酈道元撰《水經注》，其中有二十餘處引用《佛國記》。一為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。北魏在洛陽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寺廟，記當日洛陽之繁華，亦如法顯之情懷所記；但對於昔日帝王之腐化亦多著墨。

他是中國遊記的創始者。但他是撰寫印度遊記的第一人，他以後凡是西行之遊記，包括玄奘在內無不受其影響。兩漢之世南洋中早已有交通，中印海上交通雖非法顯發現；但因法顯而使得此一海上交通更為聞名全世。

以上這些雖然他都不是第一名，但以後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之發展、開花、結果都是以他為「臨界點」。否則冰不會解凍；薪不至生火。

雖然他以六十二歲高齡西行，比他同行者不是中途折返、死亡就是留住印度，但他以七十六歲孑然一身負經度海返國，九死一生；可是他生前並未受到佛教、官式之禮讚；死後至今也很少有專著研究他。

雖然他一心西行求律，取得律藏返國；可是並沒有有計畫地傳律、授學、立派。

法顯大師不忮、不求的偉大精神就在「拙、樸」二字；玄奘大師尤多「善巧」，當然時代亦決定了他們兩位大師具有不同的境遇。

孟子說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<sup>47</sup> 也即是所謂：「其始也簡；其成之也鉅。」由之可說，燧人氏發明火，比之今世發明火箭在時代上說更為艱鉅。我們以此一態度來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上之地位或許是公平的。

---

<sup>47</sup> 《四書》〈孟子先進章〉。